

Research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Tongji Canal and the Genea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anal Cultural Memory

Cui Zha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hub of China's ancient water transport system, the Tongji Canal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Grand Canal provides crucial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unraveling historical mysteries and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lineage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uch as the Songzhou Pier in Shangqiu, the Liuzi Site in Huaibei, and the living heritage of Sixian County in Suzhou,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xcavation process, shipping functions, and cultural radiance of the Tongji Canal, analy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filling historical gaps and correcting textual discrepancies. Combining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t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Tongji Canal's cultural memory—from “living transmission” to “silent rupture” and then to “archaeological revival.”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memory lineage, integrating “material remains—textual records—living folk customs,”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Grand Canal's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Tongji Canal; site archaeology; cultural memory; lineage reconstruction; Grand Canal heritage

通济渠遗址考古与运河文化记忆的谱系重构研究

张翠

宿州学院, 中国·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作为中国古代水运体系的核心枢纽,其遗址考古成果为破解运河历史谜题、重构文化记忆谱系提供了关键实证。本文以商丘宋州码头、淮北柳孜遗址、宿州泗县活态遗存等考古发现为基础,系统梳理通济渠的开凿历程、航运功能与文化辐射,剖析考古实证在填补历史空白、校正文献偏差中的核心价值。结合文化记忆理论,探讨通济渠文化记忆从“活态传承”到“沉寂断裂”再到“考古唤醒”的演变轨迹,提出“物质遗存—文献记载—活态民俗”三维融合的记忆谱系重构路径,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通济渠; 遗址考古; 文化记忆; 谱系重构; 大运河遗产

1 引言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开篇之作,通济渠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以来,就担负着连通黄河和淮河的重任,形成了“南通江淮”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贯通豫、皖、苏三省的运河,不仅见证了“舳舻相继,千里不绝”的漕运繁盛景象,而且造就出特殊的运河文化生态。不过到了南宋以后,

【基金项目】2025年宿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大运河安徽段文化研究及国际传播”(项目编号:2025BSK034)。

【作者简介】张翠(1988-),女,中国安徽宿州人,博士,讲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研究。

因为政治中心南迁再加上黄河的泥沙淤塞,通济渠就被埋藏在了地下,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20世纪末以后柳孜遗址、宋州码头等系列考古发现给这段沉睡的历史带来了契机,也为文化记忆的谱系重构创造了可能^[1]。从学术价值看,通济渠考古与记忆重构的研究,可以弥补目前隋唐运河史研究中的“实证不足”,理清运河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就实践意义来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以考古成果转化的方式实现文化记忆的系统性传递,对打造三合一的文化、生态、旅游带有着重要价值。

2 通济渠遗址考古的核心发现与历史价值

2.1 线路考证:考古实证破解千年谜题

关于通济渠的流经路线,历史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经徐州入泗水,另一种说法是经宿州、泗县到盱眙入淮。这个争议直到1999年柳孜遗址被发掘才得以解除,

在淮北市濉溪县的柳孜村开展考古工作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宋朝时期的石构码头遗迹，并且从里面挖出了八艘唐朝沉没于水底下的船只以及数量繁多的各种不同窑口烧制出的瓷器，明确了通济渠由濉溪、宿州、泗县一路进入淮河的走向。此次发掘被评选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线路空白。

而后续灵璧县凤山大道遗址地层剖面的考古，又构建起通济渠的一道“时间年轮”，整个53米长的地层剖面中泥沙淤积层和瓦砾、动物骨骼的交替沉积，清晰记载着运河从兴盛到淤塞的过程，是解读运河演变过程中的“活密码”。这些考古发掘，把通济渠180多里的安徽段线路精准确定下来，纠正了以往文献记载的错误。

2.2 功能实证：漕运体系的物质遗存

通济渠的主要功能是漕运和贸易，从考古发现的码头、沉船及货物遗存中可以看出它的运作情况^[2]。商丘宋州码头遗址出土房屋地基、船甲板和钱币证明“店铺林立，商旅云集”，是隋唐中原南下交通要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通济渠北宋年漕最高峰达700万石，折合今约11.62亿公斤，而柳孜遗址出土的几十吨瓷器残片中，有邢窑、越窑等各路窑口瓷，让通济渠有了“瓷器之路”的美誉。

造船实物见证也十分珍贵。柳孜遗址一号唐船遗留下来的4.2米拖舵，被专家命名“淮北舵”，其构造介于早期的手握式舵和北宋垂直转向舵之间，为中国古代船舶舵的发展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类技术遗存直观表现了通济渠的“黄金水道”技术支撑体系。

2.3 活态遗存：泗县段的文化延续性

在诸多遗址里，宿州泗县段是通济渠“活态遗产”的典型代表。此地现存河长47千米，有5.8公里河段保持原貌并且还在灌溉农田，因此被视作隋唐大运河的“活化石”。春日里“隋堤烟柳、通波千里”的景象，与杜牧“夹岸垂杨三百里”相呼应，成为“考古遗存—文学记忆—现实功能”叠加。这种活态延续性，就成为文化记忆重构的特殊载体。

3 通济渠文化记忆的断裂与考古唤醒

3.1 记忆断裂：从盛景到沉寂的历史轨迹

通济渠的文化记忆发生了三次转折，隋唐至北宋时，它是“御河”也是漕运主干，其记忆以活态形式存于商旅来往、市井生活及文学创作之中，李白的“梁园歌舞足风流”，杜甫的“舟车半天下”，都是其记忆的文学投射。南宋以后因为运河淤塞航运不通畅，所以记忆载体从“流动的河道”变成了“静态的地名”，比如宿州埇桥区就来源于运河古桥—埇桥^[3]。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文明进程、城乡变革等，很多遗址被覆盖，记忆变得越发支离破碎，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展大运河普查以前，通济渠历史只有散见于地方志及民间口传故事里，形成了“有文无物”的记忆断裂现象。

3.2 考古唤醒：记忆重构的实证基础

考古工作有三重路径唤醒沉睡的记忆，一是物质遗存的唤醒，柳孜遗址的沉船、瓷器及宋州码头建筑遗存把历史的记载化为可感的实体；二是历史场景的再现，淮北市博物馆用复原柳孜遗址片段和展示“淮北舵”搭建起沉浸式记忆空间，馆藏七成以上文物出自运河遗址^[4]；三是文化认同的重建，泗县段“活态运河”的保护和柳孜遗址文化景观带创建，让运河记忆再次融进当下的生活里。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唤醒的不只是官方的历史，还有民间的记忆。淮北临涣镇流传了600多年的“棒棒茶”，就是运河带来茶叶贸易之后留下的习俗，这种民俗的遗存和考古发现相互呼应，让记忆变得更加丰富。

4 运河文化记忆谱系重构的理论与路径

4.1 理论支撑：文化记忆的三维框架

依照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通济渠的记忆谱系可以分为存储记忆、交往记忆以及文化文本这三个方面。存储记忆以考古遗址、以文物为核心，有客观性、持久性特点；交往记忆存在于民俗、口述史里，如临涣茶文化；文化文本有史书、诗词的文献记录。三者之间出现断裂就是造成记忆流失的原因，因此要想实现重构就要建立起三者之间的对话机制。

4.2 重构路径：物质、文献与民俗的融合

4.2.1 物质遗存为核心的谱系锚点建设

用考古遗址作为空间节点建立层级化的记忆网络，要依靠三类锚点来实现物质遗存同记忆传承之间紧密联系的建立。在遗址公园类锚点建设上，柳孜遗址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投资1.35亿元建造了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永久性保护大棚，以大跨度钢结构为主，承重基础避开重要遗址区，尽量减少对地下遗存的影响，建筑外形模仿船桅结构契合运河文化特色^[5]。大棚里面分成了两个功能区域，第一层是封闭保护的遗址基坑，第二层设置了配套展陈博物馆以及考古模拟体验中心，在此用声光电和5G技术来还原河道构造变化的过程，通过雕塑加强现场感受的真实性。依托该遗址来融合古城汉墓、卧龙公社等周边的资源，打造运河文化的精品路线，借助废弃的铁路建设观光火车项目，建成一个“遗址展示—生态修复—旅游体验”相融共生的记忆综合体。博物馆类锚点上，宿州博物馆着重对灵璧县凤山大道遗址53米地层剖面做展示形式改良，采用分层标注泥沙淤积层、瓦砾遗存的年代与成因的办法，把“时间年轮”变为可视化叙事，灵璧县新馆以“漕运技术”为主旨，把柳孜遗址发掘出的“淮北舵”和同时期的造船工具放在一起摆放，配备动态演示古船舵发展进程，做到“地层记忆”与“文物叙事”相衔接。活态遗产类锚点以泗县段47公里运河为核心，用生态护岸+功能保留的方式保护5.8公里原始风貌河道：保留传统节制闸调节灌溉水量的功能，维持周边农田与运河

之间的生态联系,在隋堤上种植垂柳来重现杜牧笔下的夹岸垂杨三百里的诗意图景,让活态遗产成为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纽带。

4.2.2 文献与考古的互证补史

要达成记忆谱系的精准化,就要创建起文献数据库、考古遗存库、时空对应图谱三位一体的互证系统。文献数据库要包含三类文本,第一是正史和地理专著,比如《元和郡县图志》、《水经注》这些经典文献里有关通济渠线路、漕运量的记载,需要参考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等成果加以校注梳理;第二是地方文献,搜集豫皖苏三省地方志里的“运河故道”,“埭桥遗迹”等条目,还有《开河记》等专题文献里关于开凿工艺的细节描写;第三是文学文本,汇集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运河诗作当作辅助佐证。考古遗存库则是以遗址单元为单位,录入了柳孜遗址9艘沉船的形制数据,20多个窑口瓷器的产地数据以及宋州码头建筑构件尺寸数据等等,并同步标注出发掘地层和碳十四测年结果。时空对应图谱的建立需要两步来进行:第一步用考古的结果去校正文献中的错误,柳孜遗址出土的宋代石构桥墩以及沉船的位置可以确定通济渠经过濉溪、宿州到泗县的走向,这与一些文献中关于“从徐州进入泗县”的说法不符,也证实了《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汴水自商丘向东入淮的记录是正确的;第二步根据文献对考古遗存进行分析《开河记》上记载的“筑堤起岸广一百步”,参照柳孜遗址河堤宽度及夯筑方式,推测出运河修建的标准,再参考《唐六典》上所规定的“漕船载量三百石”,结合发现的沉船残骸来估算其载重能力,并据此推断出当时柳孜码头上的运货规模。另外对于文献记录含糊不清的地方比如通济渠的水源补给方式可以参考《史记·河渠书》中的“引汴水入渠”一说和泗县段河道出土的引水涵洞遗迹,来解开枯水期航行保证之谜,让记忆谱系更加完善。

4.2.3 民俗活化与记忆传播

要推动民间记忆实现系统性整理和创造性转化,就要创建起“民俗普查-遗产认定-传承转化”这整套流程。在民俗普查时期,把运河沿线古镇当作重点地区,采用口述访谈结合技艺记录的方法,淮北临涣镇“棒棒茶”习俗,不光记录晒茶,焖泡的传统技艺,还经由走访老茶客找出“茶船送货一码头售茶一茶馆聚客”的历史渊源,以此证明它和运河茶叶贸易存在关联;宿州埭桥区“造船号子”,用录音与乐谱记录融合的方法,保存这一起源于运河造船工匠的口头

遗存。遗产认定环节要形成“民俗—考古”联动评审标准,像临涣“棒棒茶”习俗能够同柳孜遗址出土的唐代茶盏残片相互印证,已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会促使它跟运河遗址一同申请文化生态保护区。记忆传播依靠传统载体和数字媒介双重手段:在传统载体上,编排大型泗州戏《柳江口》,重现运河贸易场景,举办大运河文化艺术节、临涣民俗踩街活动,把民俗展示和遗址游览融为一体;利用数字媒介,则开展沉浸式体验,在柳孜遗址保护大棚的二楼建设“虚拟运河”VR项目,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还原隋唐漕运码头装卸货情景,游客可通过互动方式体验瓷器包装、航船操舵等过程;同步推出一系列运河文创产品,将淮北舵造型运用到快客杯的设计中,用越窑青瓷的图案来装饰笔记本,经由“考古信息—文化商品—日常生活”的转变,让运河的记忆进入人们的生活。

5 结论与展望

通济渠遗址考古的实践表明,物质遗存是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柳孜遗址、宋州码头等发现不仅破解了历史谜题,更构建起记忆重构的实证基础。运河文化记忆的谱系重构,本质是通过“考古实证补空白、文献民俗补细节、活态传承续脉络”,实现从碎片化记忆到系统性谱系的跨越。

未来研究可向两方面深化:一是跨区域协同,建立豫皖苏三省考古数据共享平台,构建完整的通济渠记忆谱系;二是技术融合,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分析遗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这些努力,通济渠的文化记忆将不再是孤立的考古发现,而成为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注入持久活力。

参考文献

- [1] 余敏辉. 大运河安徽段文化标识、整体特征与当代价值[J]. 江淮论坛, 2025, (04): 45-48.
- [2] 朱诚, 陈刚, 姚付龙, 蒋小芳, 刘万青, 蔡天赦, 徐佳佳, 贺云翱. 芜申运河环境考古与古中江流域文化传播[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20, 36 (02): 116-120+124.
- [3] 朱诚, 姚付龙, 贺云翱, 蒋小芳, 刘万青, 陈刚, 王坤华, 蔡天赦. 芜申运河所经古中江流域环境考古研究[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05. 376.
- [4] 张立明. 运河文物资源集中展示利用的思考——以南运河德州主城区段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0, (14): 220-221.
- [5] 贺云翱, 冯慧, 路侃, 朱广金. 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考古勘探简报[J]. 南方文物, 2024, (04): 43-54.